

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

□ 张红侠

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曾开凿过多条河渠并逐渐形成大运河水系，历史上的大运河一般指贯通于隋朝的隋唐大运河和贯通于元朝的元明清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是为申请世界遗产而提出的专有名词，包括隋唐大运河、元明清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利用时间最久的人类水利水运工程杰作，其开凿肇始于春秋时期，主体工程历经春秋战国、隋唐、元明清三个阶段。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成为中国大运河成型河道的最早一段。隋炀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重修江南运河，疏通浙东航道，形成隋唐大运河体系。元朝忽必烈组织开辟了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后来逐步形成直通南北的元明清大运河基本格局。中国大运河纵贯 3200 公里，在 2500 多年的岁月更迭中所承载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价值被普遍认同，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构建起中华民族跨越时空的精神家园，浓缩为象征中华文明时代延续的精神内核，成为支撑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符号和国家文化名片。

大运河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内在关联密切。5000 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至少有一半时间和大运河史交织在一起，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高效积聚各项资源以保障生存发展的过程。

春秋至三国时期，开凿出邗沟、灵渠、郑国渠等多条区域性运河，用以解决运输、灌溉、防洪等问题，不断延展生存发展空间。大运河在隋代，立竿见影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唐朝依赖大运河

把东南之粟转漕到京师，大约在安史之乱以前，大运河是漕运的唯一航道。“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至元三十年（1293 年），连接江南与大都的大运河修建完成，“漕运粮储及南来商贸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明代和清中期，大运河凭借漕运通道之力，屡加疏通，成为连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交通主干道。

大运河不仅改变了沿线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水”的力量，实现了人、财、物统一使用效能的最大化，在有力实施中央统一治理、维系“大一统”的同时，成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兴盛的推动器。

大运河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相契合。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大运河作为漕运的重要载体，有效地保障了政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安定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完整。

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打破了东西走向的自然水系对南北运输的天然制约，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灌溉和洪涝问题，有助于改善民生、助推沿岸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运河的贯通突破了地理因素对多元文化交流的限制，有力地促进了南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大运河还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鉴真、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利玛窦等文化交流使者都曾在大运河的波澜涌动中留下足迹。

中国古人在对大运河进行开凿、疏

浚、运行的过程中，虽历经艰难险阻，但百折不挠、不断探索创新水工技术和漕运制度，创造出一项又一项水工奇迹和制度成果，折射出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精神活力。蜿蜒流淌、跨越山河的大运河所承载的奋斗进取精神、创新协同精神、融合共生精神、使命担当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特质。

大运河与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隋开运河，完成了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工程，自此历经唐宋元明清，大运河都是中国南北交通运输和经济往来的首善要道。历史上的大运河不仅是水路、漕路，也是商路，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贸往来的黄金水道。

明清时期，为提高运军输送漕粮的积极性，允许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在运河沿岸出售，这一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发展。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独立的交通体系，大运河的贯通，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为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提供了重要通道。据史料和文献记载，瓷器、茶叶、丝绸、布匹、书籍、文房四宝等货物经由大运河运到宁波，再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到世界各地；来自日本、琉球、安南、暹罗等国的商船停泊宁波、广州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经批准之后经由大运河，将货物运到扬州、天津、北京等商贸中心；从陆上丝绸之路运到的货物，在北京登船经大运河一路向南运送到沿线区域销售。频繁的商贸活动带动大运河沿线区域快速发展，从南到北塑造出若干富庶的市镇，使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带。

大运河与中华文化浸润相生。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

求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先民运用“天人合一”世界观和“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将人对自然河流的主观改造与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进行结合，开凿贯通而成。历史上的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南北方文化、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渠道，还滋养了中华民族千年文脉。大运河沿线区域是中国中东部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文风最昌盛的地区。伍子胥、范蠡、王羲之、顾恺之、王昌龄、孟浩然、范仲淹、秦观、陆游、范成大、唐寅、王守仁、吴承恩、郑板桥、曹雪芹等在运河一线均留下深深的足迹，创作过无数传世的诗篇、作品，成为浸润滋养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大运河昔日的漕运地位已成为过去，但大运河作为历史文物的特质和内容，却在历史的年轮中更加显现出来。大运河沿线留下了大量运河故道、水工设施、庙宇楼阁、亭台园林、碑林石刻、沉船遗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和农耕习俗、手工技艺、民俗表演、仓储文化、特色美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都成为新时代下展现民族文化魅力、彰显民族文化信心的厚重载体。在悠远历史中流淌的大运河依然是激发精神共鸣、丰盈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文化河。



（上接 1 版）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高校必须回答好这个根本问题和核心课题，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高水平办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这门课程，理直气壮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加强思政课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思政课程教师的理论水平和育人能力。结合高校工作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等学科，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以高等教育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积极营造拓展高校文化育人空间和阵地，推进新时代高校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

谋划建设一批卓有成效的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持续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推动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牢牢抓住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个根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拓展红色资源育人空间和阵地，深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牢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国家、服务人

民。创新方式方法改进高校体育工作，大力培养体育精神，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全面加强高校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塑造学生审美能力和价值取向。全面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工作，发挥党团组织和朋辈作用，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强化对知识的现实运用、对创新的切身感知。高校是意识形态前沿阵地，要坚决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着力提高网络育人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增强网络舆论引导治理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导向

高校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抓住这个根本导向推进深化改革发展。高校作为科技人才集聚地、科技创新策源地和科技创新成果汇聚地，肩负着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使命重任，是提升国家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聚焦需求构建持续提升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找准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全面提升高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突出拔尖人才培养使命，把培养国家重大战略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超常谋划、超常布局、超常培养，强化培养模式顶层设计，推动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一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高校科研创新是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在一体推进的战略谋划中深化高校科研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把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从烦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动

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坚持面向世界学术前沿和重大科学问题，组织开展重大科学计划，增强基础学科原始创新能力，强化科技创新源头活水。坚持从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推动高校组建科研大团队，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同攻关，有组织开展高水平科研创新，积极融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精神，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更多新的突破，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深化科技评价体系建设，特别是要以贡献和质量为核心的标志性成果评价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

高校要聚焦需求、明确目标，加强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的协同合作，结合高水平人才培养探索协同合作新路径，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打造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力量。坚持需求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精准有效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医教协同，把科技创新与教育改革结合起来，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促进卫生健康事业与医学人才培养协作推进，打通堵点、搭建平台、畅通机制、激发活力，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医疗服务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

一体推进教育改革、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实现路径

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以一体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路径，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核心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在“一体推进、良性循环”中找准问题、找对方向、找好路径，定向发力、系统发力、形成合力。以科技发展、国

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动态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突出实际贡献和质量导向，完善学科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系统谋划加大大一流学科、优势学科建设力度，统筹推进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抓住主要问题、关键环节，采取重点突破、定向突破方式，推动一批学科率先迈进世界顶尖水平，带动一批学科办出特色、勇攀高峰。

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卓越教学与科研创新的关系、特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快建设与教育强国相匹配的高等教育教材体系。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教必先强师，没有高水平教师，很难培养出高水平人才。坚持把高校教师队伍作为高校教育改革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深化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改革，激发高校教师的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向高端提升、向一流迈进。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工程，答好新时代如何抓实师德师风建设这个必答题，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坚持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从规模到质量的转变，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实现从一流到卓越的转变。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系统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教育治理、学术治理和服务保障支撑能力建设重塑新形态，促进符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求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构建机构精简、运行规范、管理科学、融通高效的现代高校治理体系。深入推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构建全球高水平大学伙伴网络，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和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中央，助力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

（作者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大历史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具有标识性的重要理论范畴，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研读历史、观察世界、走向未来，确立了思想指引、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学界不少研究认为，大历史观的基本内涵，是站在纵深、宏阔的时空维度，将人类的全部历史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有机发展过程，对历史进行长时段、宽视野、多角度的观察和认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看法上，还不能充分认识大历史观的深厚内涵，更不能从本质上将其与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大历史观”以及“总体史观”“全球史观”等概念区分开来。

大历史观的本质和根底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任何别的史观。历史何以成为“大历史”，何以成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首先是生产实践的历史，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不断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其他所有领域、部门的历史，包括政治活动、社会交往、文化交流、意识形态等，都要从生产的历史中获得解释。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更需要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的大历史观来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突破了从物质生产之外去寻求历史本质的其他所有范式，为我们将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充满内在联系、完整统一的大历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架构与内在支撑。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站在唯物史观所构建的彻底的、抓住历史本质的理论高度，结合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提出了大历史观这一重要理论范畴。可以说，大历史观不仅在于“大”，更在于理论上的彻底。概而言之，唯物史观是大历史观的理论根基，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时代产物。

大历史观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指南。大历史观的提出，对那些碎片化、狭隘、短视地研究历史的现象，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强大的纠偏作用。历史研究本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胸怀。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碎片化地研究历史颇为盛行，不同程度地存在研究视野狭隘、沉迷历史细节、拒斥历史规律、忽视理论思维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一些人由此认为历史发展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因而纠缠于历史的表层与细节；二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鄙薄宏大叙事，片面强调历史考据与实证史学。然而，这些终究不过是看不到历史全局，忽略历史长时段的短视做法。历史和实践的发展一再表明，大历史观才是人们看待历史、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应有眼光和根本之道。否则，只能造成以秋毫为舆薪、以瓦砾为珠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学术乱象。

大历史观是观察世界的战略眼光。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取得的崭新的理论形态，既体现着唯物史观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迅速、变化最多样、情势最复杂的时代，人类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诸多难以预测的风险挑战。如何准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绵延复兴的内在机理，如何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如何正确理解大历史观

□ 王广

都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都需要运用宏阔而深刻的历史眼光、战略思维来应对。正由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

大历史观是走向未来的重要保障。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大历史观为我们更加深入地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引领发展潮流提供了重要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回顾世界历史可以看到，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走过了 300 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产阶级为此弹冠相庆，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共产主义这一“幽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作为人类制度的标本而终结了世界历史。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幻觉，全体中国人民的接续奋斗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不断攀升。与西方国家出现民主失真、政策失败、社会失序、治理失灵等乱象相反，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保持着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以大历史观视之，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对比更加鲜明。在这种世界历史的大变化大变局大变局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从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夯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

